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向继东 选编

官员之死与发来贺电

不想提拔

当年武大没教授

夜读偶记

突然想起了张继高

莫让戴晓军成孤独的举报者

人的三根软肋

过六种人之外的生活

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公仆与做官

我对他们没爱心

常识天天讲

闲话不闲

汉武帝定律

包拯为何没罢官

感动

2009年中国杂文精选

杂文

09

2009年中国杂文精选

杂文

向继东 选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 年中国杂文精选/向继东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54-4253-6

I. 2… II. 向…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031 号

责任编辑:黄海阔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新开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20.75 插页:3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4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恕我孤陋寡闻，没有读过西方文体史，也不知西方是否有所谓“杂文”这种体裁，但凭直觉，西方长盛不衰的文体大概是随笔吧。几百年前，西方人就获得了言论自由，说话写文章，不必曲里拐弯、讳三讳四的。

本书收了傅国涌的《遥想张季鸾当年》，觉得很合我意，所以接了他的话题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乃至把篇篇短文比作“投枪”和“匕首”，开创了一个杂文鼎盛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杂文越是发达的时代越是黑暗可怕的。当年的鲁迅，尽管被誉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字“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有话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说得不好还要赔上性命。这是什么时代，还用多说吗？

杂文昌盛的时代不是好时代。杂文昌盛，言论就必然淡出了。何谓言论？傅国涌先生说：“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追求好时代，是每个公民的期望。这样的时代，应该是人人可以畅所欲言的；不会因为写几篇小文章，说几句不中听的话，或者在别人的文末签个什么名，就要送掉性命，或送进监狱，或被传讯革职。鲁迅先生在那个时代，但毕竟没进监狱，毕竟死于肺病，而不是死于扼杀。记得当年鲁迅先生在某地被“盯上”了，搬搬家，又可照样做他想做的事。那时候，

往往封了这家报馆，另一家报馆又开张了。即便有严密的审查制度，鲁迅先生的文章不照样频频出现在报端吗？所以有不少今人倒羡慕那时的鲁迅先生：文网虽密，却密而有漏。

当今杂文衰微，言论不振。许多纸媒虽曰重视“时评”，但太多写得“像杂文”，要么成了经过过滤的刻板的“据报载”，了无新意。笔者每年编书，颇费踌躇；是否“精选”，见仁见智。谁也不敢说自己揽尽“天下妙文”。

什么是好文章，也是见仁见智的。窃以为，作者首先应对生活的当下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不轻易妥协，不苟活；然后是不把简单的事情（或道理）复杂化，不把复杂的事情（或道理）说得云里雾里。

应当承认，文章是有大家、小家之分的。所谓“大家”，就是能把最深奥的道理、最复杂的事情，用最简洁明了的话语说清楚。这里要特别说明一句：我比较偏爱学问家的小品，如老一辈的有钟叔河、朱正等，晚一点的有葛剑雄、沈敏特、丁东、张鸣、景凯旋、谢泳、于建嵘、党国英等等。这些学者不仅在书斋里，而且心忧天下，行走在田野，往往小篇见大道理，普及了常识。当然，我也很喜欢那些带血性的文字，如常年活跃于言论界的邵燕祥、陈四益、黄一龙、鄢烈山、刘洪波、笑蜀、长平、熊培云等等。

末了想起一本书，是薛涌的《直话直说的政治》。我觉得这书名就很好。只有政治谁都可以直说了，那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曾经有人担心“杂文已死”，“直话直说到处奔流”；其实，这样的境界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如果说话不必再忌讳什么了，那才是真正的民族之大幸。因此，我倒希望告别杂文时代。

是为序。

向继东

2009年11月20日

世 相

- 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 葛剑雄 (3)
- 有一种舆论监督很可悲 曾 颖 (5)
- 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 刘洪波 (7)
- 打劫不用刀 魏剑美 (9)
- 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 阮 直 (12)
- 杀人事小,失节事大? 长 平 (14)
- 女记者为何误把“失身”当“献身”? 王晓渔 (16)
- 从“老师打校长”到“家长打老师” 丁 辉 (19)
- 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 魏剑美 (22)
- 我是局长我迟到 牟丕志 (24)
- 何故比作F4? 高 低 (26)
- 神童的今昔 钟叔河 (28)
- 质疑29岁市长:一个没有佳话的时代 曹 林 (30)
- 令人担忧的逆向淘汰 丁 东 (33)
- 站在领导家门口 许家祥 (35)
- 用人勿用“官油子” 黄苇町 (37)
- 一次亲民的“事故” 徐迅雷 (40)
- 为什么总说“经不住金钱诱惑” 孙存准 (43)
- 反贪局长如何会变成“贪局长”? 张 鸣 (45)
- 官员之死与发来贺电 黎 明 (47)
- 不想提拔 许家祥 (49)

为“被”字句叫屈	鄢烈山 (51)
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种遗憾	于建嵘 (53)
关于如何下医嘱和某先生是不是人的讨论	黄一龙 (55)
不敢相信	刘兴雨 (57)
知识是怎样无用的	魏得胜 (59)
真实的段子	王跃文 (62)

杂 感

我为美国记者改稿	汪 强 (65)
我所知道的以色列	周孝正 (67)
莎士比亚做什么生意?	丁 辉 (69)
神鬼也分官大小	钟叔河 (72)
爱因斯坦是一面镜子	王志龙 (74)
谈论过去不能昧于当下	景凯旋 (76)
莫让戴晓军成孤独的举报者	束学山 (78)
有权者如何“与百姓接轨”	熊培云 (80)
不恋铁腕	乐 朋 (82)
感动	朱大路 (85)
“放空枪”与“扯淡”	杨建业 (88)
弱智是不是电视文化的宿命?	丁 东 (90)
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沙叶新 (92)
最对不起孩子的中国人	笑 蜀 (95)
当年武大没教授	刘诚龙 (97)
夜读偶记(二则)	向黎安 (100)
“操事件”中的零容忍和宽容度问题	西 风 (103)
诽谤政府既非犯罪也未侵权	杨支柱 (105)
三峡明珠塔拆得很轻松很可怕	赵 勇 (108)
何物“礼金”	朱铁志 (110)
“百炼成狼”?	林永芳 (112)
“驾崩学”发微	黄 波 (114)
另类的“自杀”	沈 栖 (117)
突然想起了张继高	苗振亚 (119)

莫丢“学格”	鲁建文 (122)
人的三根软肋	刘兴雨 (124)
“我们无法改变前方”	闵良臣 (126)
过六种人之外的生活	李银河 (128)

随 想

忽然想到——就事论事	陈四益 (131)
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	邵燕祥 (135)
鲁迅与“愤青”	房向东 (139)
人人身陷“夏洛的网”	徐 强 (142)
为什么奴才在官场更容易升迁?	智效民 (144)
关于“万岁”现象的联想	王海光 (146)
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陈 仓 (148)
爱国主义：要宗族的，更要明智的	乐 朋 (150)
《南京！南京！》角川为什么是虚假的?	郭松民 (152)
我看俄罗斯的反腐败	杨建业 (155)
由加沙战争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魏剑美 (157)
公仆与做官	王 蒙 (159)
鲁迅的“骨头”	楚 梦 (161)
八戒的产权意识和悟空的金箍棒	十年砍柴 (164)
我对他们没爱心	苏中杰 (166)
虚幻的亢奋和自卑的激愤	沈 栖 (168)
常识天天讲	王国华 (171)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群众	廖保平 (173)
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随想	韩定昌 (176)
建立“第四权力”的一种努力	游宇明 (178)
公务员怎么既有特权又有美德?	伍里川 (180)
政府官员为何不理解中央执政理念	谢 泳 (182)
通钢血案：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林永芳 (184)
王小帅们为什么会造假入户	葛剑雄 (186)
T恤衫上的表达权	鄢烈山 (188)
告密的类型	黄一龙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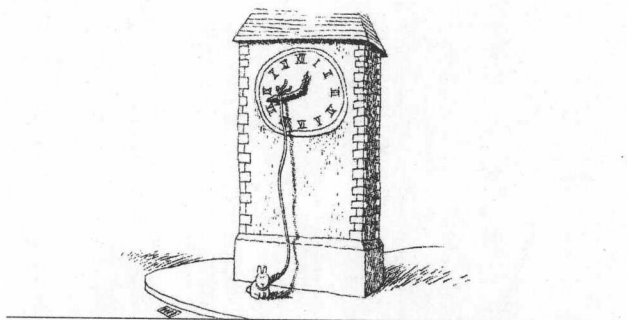
从“花瓶”到“宠物”	宋志坚 (192)
面对媒体的公民心态	沈敏特 (194)
玉皇与宙斯之比较	马亚丽 (196)
闲话不闲	吴营洲 (199)

温 故

为历史填空	雷 颐 (205)
装哑、装聋及装其他	孙存准 (209)
晚清官民冲突“问责”一例	周 彪 (211)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张 鸣 (213)
孙宝瑄的“看杀头”	黄 波 (216)
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	谢 泳 (218)
无政府主义者张继的“变节”	尤小立 (220)
外国人笔下的袁世凯	周 彪 (223)
慈禧的求新与保守	李恩柱 (225)
遥想张季鸾当年	傅国涌 (227)
知识的傲慢与偏见	顾思齐 (230)
“抗日散”和“反日丹”（外二则）	胡文辉 (232)
民国时期的“封口费”	郑连根 (235)
深一层看告密	朱 正 (238)
“老新四军”讲过去的故事	戴 煌 (240)
我和兰考的悲喜剧	任彦芳 (243)
马非百与郭沫若	吴营洲 (245)
最是从容不易学	徐怀谦 (247)
陈独秀当年为何不喜欢《红楼梦》	舒新宇 (249)
梅贻琦的操守	游宇明 (252)
帝王戏和爱戏的帝王	十年砍柴 (254)
清朝两位皇帝的两种南巡	叶楚华 (257)
汉武帝定律	赵健伟 (260)
话剧《资本论》的宣传言过其实	韩三洲 (263)
“陈寅恪有什么了不起？”	王 晖 (265)
包拯为何没罢官	王重旭 (268)

视 点

- 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 高占祥 (273)
- 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沈敏特 (275)
- 尊重人还是尊重人才 狄 马 (277)
- 《中国不高兴》就是一场秀 景凯旋 (279)
- 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消灭自己” 廖保平 (281)
- 关注“贫二代”更有价值 长 平 (283)
- 改革制度使民众不抱怨 于建嵘 (285)
- “公民社会”是治理关键 吴建民 (288)
- 阎政平砸车是正当防卫 杨支柱 (290)
-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女士” 曹 澍 (292)
- 傅斯年的“国学”观 欧阳哲生 (295)
- 告别“屈原人格” 傅国涌 (298)
- 高考作文应该转向“公民体” 王晓渔 (300)
- 个性官员为何屡屡出现 刘洪波 (302)
- 总理可以做县官县治就会有希望 笑 蜀 (305)
- 腐败是转型社会润滑剂? 党国英 (308)
- 现代青年都应笃信一个人的五四 单士兵 (311)
- 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 党国英 (313)
- 给农民钱,更要给农民权 李昌平 (315)
- 小学语文的真正问题是现代价值缺失 杨于泽 (317)
- 有一句话,我从来不说 沈敏特 (319)
- 少数人的权利 崔卫平 (322)



世 相

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

葛剑雄

据《兰州晨报》报道，7月26日，甘肃省凉州区公检法系统竞聘笔试中“突破常规思维，聘请19名少先队员担当‘监考官’，结果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学生‘秉公执法’，当场抓住25名作弊考生”。据称此事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更多的人认为，此举必将在凉州区的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方面产生积极的效应”。

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考试制度与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悲哀，这是违背保护未成年人法规的冒险试验。

其实，正如报道中引用武威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并参与多次监考的干部高先生的话：“其实，成人监考官要发现考生作弊也非常容易，从讲台上往下看，认真考试的考生和想要作弊的考生的举动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一个是埋头答题，一个是东张西望坐立不安。”“大人在担当监考官时常常会有更多的顾虑：管得太松就是失职，管得太严又怕‘引火烧身’，往往会形成监考的‘中庸之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得不动用小学生监考的根本原因是成年人的失职和堕落。近年来，我们听到见到的监考失职与舞弊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如吉林松原的高考中，异地监考的教师无法制止已发现的作弊，离开考场后被打；考生公然抢夺他人试卷抄袭，监考教师未采取有效措施；对考场内大量公开作弊行为熟视无睹等等。这些既反映了监考教师本身的失职，更说明主管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病。

根除考试作弊，特别是党政部门考试中的舞弊，是当前反腐倡廉的重要内容。显然，如果不是从加强法制、加强教育、强化职业道德、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着手，即使挖空心思采取新招怪招，结

果必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能造成考试舞弊的“创新”。

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其实，孩子们之所以能“秉公执法”，还是因为对方措手不及，关系网、权势网、包括家长和教师同学在内的各种关系还来不及起作用。如果再搞第二次，小学生中肯定会有人受到家长或教师的阻拦，或者同样会接受请托。考生也不会那么老实，心甘情愿接受小学生的执法。甚至可以采取更简单的办法，抵制由小学生监考的考试，因为未成年人本来就不具备像公检法内部考试的监考资格。再说，如果上级部门不承认这样的结果，或者不据此作出处分，小学生有办法吗？

从保护青少年出发，也不应该让小学生承担如此繁重而有风险的任务。小学生具有发现并判定作弊的行为能力吗？如果被查考生不承认，小学生的判断具有法律效力吗？万一考生不服，或者故意伤害小学生，包括事后报复，谁能充分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利益？

我忽发奇想，还不如请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设计制造监考机器人，或者设计一种完全隔离、具有系统监控能力的考试房，可以绝对做到铁面无私，确保记录下任何作弊现象，比任何人都强。但我很快就失望了，要是腐败不除，社会风气不正，有能耐的人完全可以不理睬考试，机器判断的作弊结论又有什么用？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4日）

有一种舆论监督很可悲

曾 颖

近日，成都一家电视台播出名为《爷爷奶奶的大头娃娃》的专题片，讲述的是一个患先天性脑积水的小女孩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沿街乞讨的故事。因为片中所拍的场景都在我家附近，那行乞的爷爷、奶奶和巨头小脸、病入膏肓的小女孩我都见过，并和许多成都人一样，给他们捐过钱，所以，就很关注节目究竟拍了些什么。

照我心里对此类节目的判断，大致应该是以悲悯的情怀，拍拍一家三口的不易，以及小女孩的病情，如果条件允许，甚至可以组织一些商家和医疗组织来帮助他们，让小孩子得到及时的救治。

但电视的拍摄思路让我大出意外——这样一个悲惨的题材，被他们采用了质疑周久耕“至尊香烟”式的方式，层层递进，抽丝剥茧，进行了所谓的还原真相式的调查。所有的采访，都为预先想好的“有人利用小孩子的病在敛钱”这一主题服务，所进行的调查，无非是在寻找“证据”。思路颇像以往曝光乞丐的新闻操作方式，前半节暗访“可怜”行乞者，后半节展示他们修房子吃肉喝酒之类“奢靡”生活。

在这期节目中，我看到记者们不厌其烦展示的种种调查结果——小女孩住宾馆、吃“安利”，在老家还修有房子，每天收入上百元。这些平常人的普通生活，因其“乞讨”，而变成了罪行。

他们所曝光的内容，我并不陌生。小孩住的那家宾馆，是一家招待所性质的低档酒店，据我的调查，是爷爷、奶奶为了让小孩有空调降降温，好受一点，忍痛住的。为此，他们一家省吃俭用，每天的生活费仅十几元钱。而电视台记者拍到的他们家乡的所谓豪宅，也只不过是普通住房。至于孩子的病情，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据一位采访过那位爷爷的记者说：

说他们为了敛钱而上街乞讨，已不只是无耻了！

作为一个曾经受“骗”的人，我决心疼往他们面前的盆里放过钞票。我更不嫉妒他们“每天赚上百元”的“好运气”。因为我明白，那样的收入，对于孩子的病，只能是杯水车薪。

而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想给做这类题材新闻的同行说几句话：你们不遗余力地想做舆论监督报道，使社会空气更纯洁的思路是正确的，只是方向似乎不对。因为即使用脚后跟想也知道，对社会公平的伤害和道德秩序的破坏，决不是沿街乞讨的大头娃娃及其家人可以搞定的。即便他们在绝望应急状态下，说了或做了什么不太符合道德的事，我们的眼光，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种行为背后的无奈与可怜。如果不明白这一点，而是高高地举起道德杀威棒，对着这些弱势者勇猛出击，那就太缺少悲悯心了。

从电视上细致而娴熟的调查手法，感觉得出调查记者们很受当年“扒粪者”先驱们的影响。但请千万记住，人家当年的“扒粪者”，所扒的对象是垄断集团、大财阀、不作为的官僚和违法行政的政府机构；而你们所扒的对象，多为假乞丐、做假货的小贩或站街下岗女。这种把眼光向下的舆论监督，究竟能引起民众多大的尊敬和社会多大的进步？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1日）

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

刘洪波

请像记住孙志刚一样，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

河南省新密市28岁的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拉开的不只是他的胸膛，还拉开了这个国家职业病防治的一系列隐埋的陷阱。

张海超在一家耐火厂打工，因胸部不适和咳嗽，被郑州、北京多家大医院诊断为尘肺病，然而法定的职业病诊疗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给出的诊断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建议进行肺结核诊治。为此，张海超不得不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胸验肺，结论为“尘肺合并感染”。

我不知所有读到这个新闻的人，是否会如我一样产生无力感和悲愤感。一个罹患职业病的工人，为了到法定机构做职业病诊断，需要获得导致他患病的工厂出具的证明，历经上访后他获得了必需的材料，而职业病法定诊疗机构却称他没有患职业病，并且建议他做职业病的治疗。仅仅为了证明自己有职业病，这个工人不得不自费打开自己的胸膛。

张海超确实是尘肺病，这已经由开胸检视所证实。然而，他现在还只是“医学尘肺病患者”，他作为尘肺病患者的法定身份，仍然需要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确定。这是一个拥有“知识法权”的单位，这个“知识法权”单位未能治疗他的尘肺病，却能够剥夺他作为尘肺病患者的资格。啊，他们是“严格按照尘肺诊断标准来判断的”！

张海超早已被发现肺部有问题，但检查结果被他打工的工厂扣留。当他有了自觉症状并得到多家医院的检查确认时，他打工的工厂拒不出具必需的检测许可，当他通过上访获得许可后，法定诊疗单位否定了他的病情。按照程序，他染上职业病以后，几乎只有等死一条路可走，而且按照